

红色记忆

“活着的小萝卜头”与《大豆谣》

■李新潮

2022年筹备成立市延安精神研究会期间，同事推荐康杰中学的退休语文老师罗力立为研究会会员，说她是革命烈士后代，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

很小的时候读过宋振苏（小萝卜头的二姐）写的《我的弟弟小萝卜头》（1964年出版），深为书中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和英勇行为所感伤、所感动。可以说，“小萝卜头”的故事影响和教育了几代人。至今，《我的弟弟小萝卜头》一文还收录在小学三年级语文课本里。文中讲到她的弟弟宋振中8个月大的时候，随父母（父亲宋绮云，杨虎城将军的秘书；母亲徐林侠。两人都是中共党员、革命烈士）一同被关入狱，在监狱里被关押8年。由于监狱里的恶劣环境，宋振中严重发育不良，头大身子小，被狱友们疼爱地称为“小萝卜头”。1949年9月6日，8岁的“小萝卜头”与父母和杨虎城将军一同被国民党匪徒残忍杀害，成为我国年龄最小的革命烈士。

知悉我们的会员中有一个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的革命烈士后代，我们很想立即前去拜访，无奈因为当时的疫情形势，又考虑到罗老师年事已高，恐给她带来不便，拜访之事只得一再延后。

岁暮春过后，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元宵节前夕，我便与研究几位同事一同前往康杰中学家属院里看望和拜访罗老师。我们向她介绍了研究会筹备及召开的情况。罗老师虽已84岁高龄，但思维敏捷，豁达开朗，对研究会的工作很关心，询问了有关事项，表示愿就“传承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为研究会做些工作，并向我们赠送了两本亲笔签名的著作。一本是她与范圣子合著、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黄河在召唤——罗云鹏传》，一本是她自己著的《大豆谣》（读者出版社2022年5月版）。

罗力立老师和《红岩》里的“小萝卜头”宋振中有着几乎相同的经历，都是8个月大时随父母一同被捕入狱。不同的是她被国民党关押6年后幸运地活了下来，因此被称为“活着的小萝卜头”。

《大豆谣》一书以一个6岁孩童的视角，回忆记述了“小囚徒”罗力立和父母及众多“大朋友”狱友苦难的监狱生活和英勇不屈的革命斗争故事。

罗力立的父亲罗云鹏，原名张敬载，张会璇、张西平，1910年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兴隆镇一户殷实的家庭。早年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他就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成为一名学生领袖。1937年“七·七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罗云鹏按照党的指示于当年8月奔赴革命圣地延安，进入中央党校学习，

后被派到陕北公学（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一所具有统战性质的干部学校）工作。1938年年初，罗云鹏受中央委派到兰州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为甘肃省抗日救亡运动和党组织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1940年中共甘肃省工委遭到破坏后他不幸被捕，在狱中坚贞不屈，多次组织狱友同敌斗争，曾帮助多名同志成功越狱，而自己则于1946年2月22日被国民党杀害，年仅36岁。

罗力立的母亲张英（原名樊桂英），运城安邑人，生于1916年，早在运城女子中学读书时就参加过学潮，1935年进入陕西省高级助产职业学校学习，加入了党领导的民族解放先锋队。1937年被党组织送往安吴青训班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毕业后于1938年5月被党组织派往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后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驻甘办事处”）。当年办事处处长为伍修权，谢觉哉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驻办事处的代表。1938年6月初，组织任命张英为中共甘肃省工委所属的妇女委员会组织委员。因掩护地下工作身份需要，1938年8月，经谢觉哉提议并和夫人王定国牵线，组织决定张英与时任中共甘肃省工委副书记罗云鹏秘密结婚为伴侣。1939年9月17日，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取名罗俐丽，意为聪明美丽。

1940年6月6日，在国民党大搜捕下，甘肃省工委机关遭到破坏，罗云鹏被捕。次日，张英和8个月大的小俐丽也被国民党抓进监狱。由于监狱里恶劣的生存环境，加上狱警非人的残酷折磨，幼小俐丽的童年和温馨幸福的成长环境，然而从她开始感知世界和认识周围的人，接触的都是阴森森的牢房和面容憔悴、衣衫破烂、伤痕累累的“囚犯”。惨无人道的狱警甚至以小孩不是犯人而不给罗俐丽口粮，是监狱里的叔叔阿姨们每人每天从自己嘴里省下一点，共同把俐丽养起来的。一次放风时，一位老奶奶送给俐丽两块饼干，而俐丽不知道这是何物，觉得不好玩，扔在了地上，母亲连忙捡起来告诉她这是好吃的“饼干”。小俐丽有生第一次吃到了今天孩子们都已吃厌了的“好吃的”。有一天放风时，俐丽看见院子墙角里有一块像是饼干的东西，捡起来就放进嘴里嚼，一会儿嘴里居然冒出白沫，母亲见状急忙夺下来，原来是这半片肥皂。

在艰难的岁月中，俐丽长到4岁的时候，爸爸开始教她写字。由于繁体的丽字太难写，父亲便将她名字改成“罗力立”，新名字既简便又好写，更多了些“有力量站立起来的深意”。监狱里，唯有力立是小孩子，可以到处走动。她常从牢房

透饭的小窗口里爬进爬出于各监室之间，听叔叔阿姨为她讲故事，跟他们学唱歌、学跳舞、学认字，同时也为狱友传递信息，成了监狱共产党人之间的秘密联络员。她结识的“大朋友”中，有教她认字的郭叔“郭叔叔”，有和她一块学字的老红军王昌明“王伯伯”，有深深疼爱着她的王德纯“王妈妈”，有对她照顾有加的王芳玉“王姨”，有临刑前把贴身毛衣拆下来为她做成一个圆球玩具的胡润宝“胡叔叔”……其中还有一位长着大胡子的叔叔，他就是有“西部歌王”之称的王洛宾。王叔叔教她学会了不少歌曲，学会了跳新疆舞。一天放风时，小力立神气地问王洛宾：“叔叔，你说，世界上什么东西最好吃？”当王洛宾答出几样东西后，都被小力立摇头否定了。最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粒大豆（蚕豆），十分认真地说：“叔叔，你看，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听着小力立稚嫩的童音，看着她那干瘦的小手和十分天真的表情，王洛宾抑制不住一阵心酸，满怀悲愤地，在一张小小的烟盒纸上，为小力立谱写了一首《大豆谣》歌曲：

蚕豆杆，低又低，结出的大豆铁身体。力立对因饿夸大豆，世界上吃的数第一，世界上吃的数第一。

小力立，笑眯眯，妈妈转身泪如雨。街头上叫卖稀饭，牢房里大豆也稀奇，牢房里大豆也稀奇。

小力立，有志气，妈妈的哭声莫忘记。长大冲出铁大门，全世界大豆属于你，全世界大豆属于你。

1946年8月，父亲罗云鹏就义后，国民党查不出力立母亲共产党员的实据，同时加上监狱里人满为患，就把她们母女释放出狱，但她仍处在监视之中。为避免给当地党组织带来危险，按照丈夫罗云鹏临别时“有机会要回‘家’，带好孩子”的嘱托，力立母亲决计带着力立“回家”到延安去。然而由于时局变化，国民党猖狂发动内战，重兵围剿延安，已经无法前行。辗转两年多，到了1948年8月，母女二人从西安和外婆一起回到了解放区运城安邑老家。解放后，罗力立母亲樊桂英于1950年7月10日被山西省委组织部决定恢复了党籍，并参加了工作，成为妇产科医生和医院的领导。罗力立牢记父亲嘱托，自强自立，刻苦学习，于1961年从学校毕业后回到母校运城康杰中学任教，直到1994年退休。

从教34年中，罗力立老师一直低调行事，兢兢业业，教书育人，可谓桃李满天下。退休前很少有人知道她的身世和坎坷经历，她更没有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与她曾在一个语文教研组共事多年，后任运城市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市委主委的闫义勇，也是在前些年甘肃来人召开座谈会时，才了解到罗老师及家人为革命作出奉献和牺牲的一些真实

情况。在他印象中，罗力立老师“学养深厚，教风朴实，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热爱教师岗位，热爱学生，平易近人，亦师亦友；人格高尚，心地善良，淡泊名利，豁达大度。在她身上时时处处体现着根植于内心的向上向善、一身正气的修养表征”。

在过去很多年里，罗力立老师和她父亲过去的战友及狱中的难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谢觉哉、伍修权、王洛宾、“赵伯伯”“郭老师”“王阿姨”等及当地政府对她们母女和她这个烈士后代给予了不同程度的关怀和照顾。1994年，耄耋之年的王洛宾还专程来到运城看望力立和她母亲，给她带来了一大包蚕豆，并在时隔50年后再一次和她一起唱《大豆谣》。

在甘肃兰州，罗力立和父母的事迹几乎家喻户晓。1992年她应约为兰州市委宣传部撰写了回忆录《冬天的春天》，被《兰州晚报》等媒体刊载后引起轰动。1998年该文被补充修改扩充成《大豆谣》一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为她题写了书名。2020年，兰州市将《大豆谣》的故事改编成同名儿童剧，该剧入选第十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优秀展演剧目”。2021年3月20日，中共兰州市委宣传部、兰州市文化和旅游局、兰州市教育局等单位举办了儿童剧《大豆谣》首演暨兰州市中小学生学习观演活动。同年82岁的罗力立老师应邀出席了观影活动，并上台发表了振奋人心的感言。当人们得知她就是《大豆谣》主人公原型时，台上台下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不少人流下了感动的眼泪。在为期三个月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红色题材儿童剧《大豆谣》”观演活动中，兰州市40多所中小学近2万名师生观看了演出。2021年9月1日，兰州市中小学开学第一课课堂教育中，全市1600多所学校的46万多名中小学生，同看、同唱《大豆谣》。

2022年5月，《大豆谣》一书修订再版时，著名作家梁晓声审阅了书稿并饱含激情为书作序，称《大豆谣》是一部“纪实性的、革命品质的回忆录”，“是所有革命回忆录中很不寻常的一部，独一无二的一部”，“值得一切年龄的人来读，特别值得今天的青少年来读。凡读过的人，必会像我一样，更加明白曾经的中国共产党员是些怎样的人，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革命为什么必然能成功”。

罗力立——“活着的小萝卜头”故事感人至深！

《大豆谣》——一部传承红色基因、讲述红色故事，进行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

（作者系市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市音乐家协会换届

本报讯（记者 郭华）1月9日，运城市音乐家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召开，来自全市13个县（市、区）的80余名会员参加。会议选举郭华同志为新一届运城市音乐家协会主席。

过去7年，在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的领导下，市音协团结全市广大音乐爱好者，紧紧围绕“文艺服务人民”这一中心任务，创作完成了《河东颂》《关公颂》等多部脍炙人口的声乐作品，组织开展了多场弘扬主旋律的文艺演出，为丰富我市群众文艺生活、繁荣我市音乐事业作出了贡献。其间，市音协加强对外交流，带着河东民族音乐走进国家大剧院，走进深圳、泉州，向世界传播河东声音；也带着乐团走进社区、走进校园、走进乡村，用接地气的演出触摸民心。

接下来，市音协将与全市音乐工作者一起把握新时代新机遇，进

一步强化思想认识，把准历史方位，展现时代新作为；站稳人民立场，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把握核心任务，着力培养高质量音乐人才；聚焦中心环节，推出更多紧跟时代的精品力作；将创作触角聚焦河东大地，用音乐讲好运城故事，为全市高质量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市文联希望全市广大音乐工作者要坚持正确文艺方式，奏响体现时代发展和时代进步的主旋律；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作更多人们喜闻乐见的音乐精品；坚持传承中华优秀传统音乐文化，不断推动河东音乐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持德艺双馨，主动履行“人类灵魂工程师”的神圣职责，总结经验，用音乐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为繁荣发展运城文艺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观后感

捧给河东儿童的新年厚礼

梁周全

坤金针，百日后挖开泉眼清泉复流后，人们雀跃欢喜的场景和情绪，深深感染了现场观剧的小观众们，甜姑的形象在孩子们心中也变得更加有生命力，更有温度，更加可亲高大，直至生发出对盐池的无限热爱，涵养培植了孩子们心灵深处的善良与勇敢。

《哑姑泉》整场演出自始至终，孩子们观看得全神贯注，全身心融入到剧情之中。孩子们在课堂上，眼睛和精力随着老师走，当晚我看到我的孙儿和周围的孩子，眼神和情绪完全随着台上的演员转，一会儿高兴，一会儿激动，一会儿欢畅，一会儿忧心，剧场里数次响起孩子们小手鼓出的掌声，也是真情与童心的流露。演出结束后，孩子们的情绪还是异常高涨，久久不能平息。儿童剧《哑姑泉》寓演于乐，寓演于理，启迪了孩子们的心灵，增长了孩子们的智慧，是运城幼师高专给河东儿童送上的一份精神文化套餐及新年厚礼。

这次运城幼师高专走出校门进行社会公演，是创新发展河东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运城盐文化的迅速行动

与精准实践。

没有儿童剧的戏剧资源库是不完整的剧库，没有儿童剧的舞台是不完整的舞台。虽然《哑姑泉》上个世纪50年代就有四幕歌舞剧，是由剧作家张万一先生改编，在山西歌舞剧院演出，时任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田汉观剧后兴致未尽，又赶赴故事发生地——运城盐池寻踪采风，并挥毫泼墨赋诗一首：“金针挑出万人甜，故事真堪入管弦。千古中条一池雪，停车争访哑姑泉。”给池盐文化增大光添重彩。2020年，山西省蒲剧艺术院演出一团精心打造的新编蒲剧《哑姑泉》与观众见面，受到一致好评。

往昔峥嵘今可追。这次由运城幼师高专儿童文学课程组创作改编的儿童剧成功将文化内涵与儿童视野深度融合，既体现出了河东文化的厚度，更凸显出儿童文化特色。剧创作在总体构思上，着重突出“一切为儿童”的理念，在舞美、灯光设计等方面又契合了儿童的审美观。该剧为河东儿童讲好河东故事开了一个先例，给我们河东戏剧资源库填补了一项空白。

书记梁廷华兼组织部部长，河津县委书记高峰兼宣传部部长。马平定参加中共七大回来之后，历任兴县县委书记、晋中八地委城工部副部长、晋南十地委城工部副部长。1947年河津解放后调回河津，任县委书记兼县长。

调回河津后，他带领全县人民建立人民政权，组织健全政府机构，一方面带领全县人民大搞土改运动，另一方面抽出一部分力量大搞支前工作，各项工作成绩斐然。当时马平定和县农会副主席王子云到尹村给王震司令员汇报河津的土改试点工作，得到首长的肯定和表扬。到1947年其调任甘肃定西地委时，还带走北里村革命青年李相永、李科子、李永录、李铁子等人。后李相永担任了定西地区工委处长职务。

北里村由于受西地委的影响和马平定书记的熏陶，进步青年纷纷参加革命，仅新中国成立前北里村参加工作就多达53人，是全县参加工作人数最多的村庄，南下干部遍及广东、云南、浙江、四川等地。

1947年年底到1966年5月，马平定先后担任甘肃定西地委副书记、书记并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央重工业部有色金属局人事处处长等要职。1971年到1980年任陕西省安康地委常委、陕西省钢铁研究所党委书记、陕西省冶金局顾问等职务。

1980年12月17日，马平定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逝世。遵照生前留下的遗嘱，其骨灰被撒在家乡河津的汾河两岸。



1月9日晚，由万荣蒲剧团精心打造的原创大型蒲剧《李家大院之博施济众》在万荣县大礼堂成功上演。该剧根据李家大院李用、王和君等救济晋南受灾百姓的事迹改编，充分展现了蒲剧高亢激昂、大气磅礴、委婉动听等特点。

特约摄影 解建国 摄

本版责编 游映霞
美编 冯满楠
校对 郝鹏飞

人物志

河津地下县委书记马平定传略

■李志厚

赵敬斋相继调走，马平定接任了县委书记，全部工作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当时县委成员是书记马平定，组织委员姚五福，宣传委员杨富泰。据郭一民回忆：根据乡吉特委命令，中共河津县委提前转移到北里村驻扎。这样县委书记马平定就以走亲戚的名义，跟其母亲居住在北里村。北里村独有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脉关系，给河津地下县委造就了良好的革命环境。

马平定到北里村，慢慢和邻居熟悉起来，每天拿镰挎锄到沟里割草，村里人习惯叫他“平娃”。至于他所干的“其他”事情，无人知晓，直至解放后，人们才知道他是中共河津地下县委书记。

为发展壮大党的组织，马平定在午南芹以牺盟会的名义召开了全县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了党中央关于把工作重点由城镇转向农村的具体指示精神。同时，他在河津大力发展农村党组织。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多的时间，全县已发展有党员360多名。

马平定在任河津县委书记期间，要求地下党员都必须以职业为掩护，开展抗日斗争。他本人在北里村利用亲戚李牛子家的杂货铺，成为秘密联络点。马平定在北里村组织的家戏班子成为当时秘密交通联络工具。据北里村李德恒回忆，马平定在村里借着成立家戏班子的名义，一有空就在排戏场看戏，并且和戏班子的李德恒、李明山、李钟秀、李当朝拉关系、交朋友，并且经常建议，让家戏到乡宁、吉县等地演戏，有时他也跟上戏班。解放后，才知道他是利用戏班这个通道和上级党组织联系。解放后，马平定担任河津县委书记，还以县政府的名义给北里村家戏赠送了横标，“农余剧团”四个大字，一直挂到上世

纪六十年代。

马平定还紧紧抓住北里完小这块阵地发展和培养人才。1938年3月5日，日寇侵占河津后，全县学校停办，只留下北里和上井完小。马平定抓住这一机遇，给北里完小从校长到教员安插地下党员。解放后，从这里出去的学生绝大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里完小被称为“河津的抗大”。

1938年年底到1939年初，县委还要求各区委创办抗日战报，当时汾南区委办的是《燎原报》，北坡区委办的是《烽火报》。这两份战报大大鼓舞了全县人民的斗争，削弱了敌人的锐气。

1939年12月份，马平定参加了在晋西南区党委所在地孝义召开的党代表大会，会上，马平定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1944年12月到1945年8月，马平定以晋西南区党代表资格参加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1940年9月，马平定被调到乡吉特委任组织部部长，河津地下县委班子进行了调整，高峰接任县委书记，杨富泰任组织委员，赵茂竹任宣传委员。随即地委根据斗争需要，设河津、稷山、新绛为一个中心县委，马平定兼任书记，稷山县委

在河津党史上，原第二任地下县委书记马平定是开创河津地下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的卓越领导人之一。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和革命前辈辈回忆录，认真收集整理，挖掘整理有关马平定的革命事迹，让更多的人了解那一段尘封的历史，缅怀先烈，激励后人。

马平定生于1916年2月22日，是原河津老城文昌盛人，祖籍连伯村，解放后在城北分了房屋，从此全家定居城北村。

马平定家境贫寒，断断续续读过三年小学，13岁开始在陕西华阴兵工厂、家具厂当工人，回家后在吴家关村当伙计。1934年经人介绍到太原西北炼钢厂当工人，初步懂得了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才有力量这个道理，认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大的力量。1937年6月，他积极参加组建了牺盟会。此时，由于炼钢厂关闭，马平定转回河津，和牺盟会特派员刘山澍等共产党员一起，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发动工作。经刘山澍、郭一民介绍，马平定于1937年10月初加入共产党。10月28日，中共河东特委特派员赵敬斋（河津连伯村人）、中共山西省工委特派员郭一民（河津修村人）等人在马平定家东房商讨，宣布成立中共河津县委，郭一民任书记，马平定任组织委员，赵敬斋任宣传委员。当时全县共有18名党员。面对河津复杂的斗争形势，中共河津县委既要发展武装游击力量，又要稳妥地发展党组织。

1938年3月5日，日寇侵占河津县，郭一民、